

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动态

总字24期

2000年3月28日

凯恩斯水土不服

杨继绳

凯恩斯来了，他是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繁荣的时候来的，正如他当年到美国的时机一样。但中国的情况没有美国当年那么糟。当然，我不是说凯恩斯这个人真的来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古了54年，我是说他的"主义"来了。

1998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人们忧心忡忡，经济学家急忙从各种教科书中寻找药方。他们想到了挽回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英雄。于是，中国经济界开始大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这个名字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顿时高了起来。

然而，两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同他来的时候差不多。他在中国的神通也没有在美国那样大。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

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危机。那时多数经济学家迷信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经济从低谷中拉起来。而现实并非如此，30年代整个10年平均有18%的劳动力失业，高峰时失业率达到25%，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黑暗隧道中煎熬着，看不到尽头。

大危机是对资产阶级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大冲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能为力。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来到华盛顿。其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着手采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政策：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按这种理论，罗斯福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了。新政要求新理论的支

持。凯恩斯本来就不相信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他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那时正在酝酿之中。他到美国和罗斯福一拍即合，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新政。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他的理论也在完善。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出版时，已经有了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依据。

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必须想办法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刺激消费；企业界没有办法扩大投资，政府必须担当起投资的责任。政府从哪里弄钱来投资呢？赤字财政。他认为，在出现萧条时政府应当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预算出现赤字；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政府增加税收，紧缩财政开支，取得财政结余，偿还萧条时发出的债券。

罗斯福新政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经济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政策重点是用需求带动生产。办法之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办法之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1929年，政府的总开支约为100亿美元，1933年，增加为130亿美元，1936年增加150亿美元。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也有起色。经过政府三年“注射”之后，国民总所得额与国民总消费额上升了50%，但政府的投资计划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仍有900余万人失业，直到二战期间政府投资扩大到1030亿元，就业问题才得以缓解。显然，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进入了黄金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功劳，但凯恩斯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

凯恩斯在中国的遭遇

1997年夏天，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大概想起了凯恩斯当然说过的话：为了刺激经济，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得靠财政政策，因为你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于是，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只能领先财政政策”。他们拿来了凯恩斯的办法：“运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性投资主要靠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7年10月开始，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度进一步增加。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策采纳，财政部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罗斯福新政”。

凯恩斯终于被请到中国。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付诸实施，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1000亿元，1999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直接投资。为此，政府大量举债：1998年年初计划发行国债2808.5亿元，下半年又追加了1002.5亿元。1999年初计划发行国债3415亿元，后又增加600亿元。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1999年国家财政为增加居民收入共支

出540亿元，使全国8400万人受益。

应当说，凯恩斯理论对治理中国的通货紧缩起了一定的作用它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但是，国家经济还没有走出不景气的阴影。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连续26个月负增长，企业经济困难，凯恩斯的根本目标是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恰恰在这两点上效果不佳。

政府投资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投资还很不景气，投资是拉动需求最重要的力量。投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没有启动起来。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1年—1998年分别为：

23.9%、44.4%、61.8%、30.4%、17.5%、14.8%、8.8%、14.1%，1999年1—8月为10.4%。1998年的14.1%是在1997年过低的基础上的增长，对启动经济拉动力太小。1999年9月，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幅度为-2.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7.3%，10月开始回升，但回升乏力，到11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仅增长0.1%。

为什么民间投资没有带动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者无钱可赚，所能看到的商品都过剩，往哪里投资？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资。据权威研究部门测算：2000年内需不足缺口为1800—2000亿元。这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怪圈：投资不景气—需求不足。二是互为因果。

凯恩斯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费需求还是扩大不多。其中也有中国的具体情况，收入差别太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支付能力。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1997年的3070.2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差额，由1997年的99.2亿元扩大到1996年的23179.5亿元。占全国人口总数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总人口70.9%农村居民，其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占全国总人口70.9%的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三分之一强。1978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为2.9比1，1985年缩小到2.4比1，1992—1993年扩大到3.5比1。1997年为3.1比1。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层和占人口20%高收入层差别是很大的。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倍。

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两年了，时间不算短，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效果不显著？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橘生淮南则为枳

凯恩斯在中国遭遇不佳，是因为他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水土"和当年美国的"水土"相差甚远，要让凯恩斯在这里大显神通，那就勉为其难了。

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美国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一次调整0.25%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中国利率调整几个百分点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美国以私有经济为基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民间资金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大多存在国家银行中，已为政府所用。这是政府投资没有带动中国民间投资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企业不同于美国的企业。美国以私有企业为主，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企业还在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美国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解雇工人，中国企业不能。

中国的政府不同于罗斯福的政府。罗斯福1933年宣誓就职时，他在白宫的助手了了无几。一名厨师，一个电话员，若干保镖，几名秘书，还有两位应募前来效力的南方新闻记者。当然，随着新政的实施，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多了起来。但是，在他们那里，政企不分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扩张冲动也是没有的。在中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国有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在锅饭，官员和企业对投资的效果不负责任的问题还没有根除。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难以避免。

在中国这个"水土"上，凯恩斯的扩张政策效果不显著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这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可能会生理 复前些年的"紧缩—通胀—紧缩—通胀"的循环之中。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债务比重较大，在目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银行的资产的质量降低了。这是因为：

通货紧缩 无法还本付息的企业增多 企业对银行不良债务更加严重 银行的可收回的债权缩小：

物价下降 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放大（从反面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升，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会缩小，几次恶性通胀就会把持币者的债权化为乌有） 银行债务相对增加：

将以上两项综合可知，通货紧缩使得银行债务增加，债权减少。债权是属于储户的，债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结果是银行对储户支付能力双重减弱，金融风险加大。银行的债务越来越重，它的债权又收不回来，怎么走出困境呢？通货膨胀是消除银行债务即剥夺持币者的债权人最有效的手段。如果通货膨胀1000倍，则银行的债务就消除了99.9%。也就是说，银行的金融风险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这说明，我们存在通货膨胀的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手中持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他们会立即在兑换成外汇。中国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寻求外汇以保值。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会排上挤兑的长龙。金融危机就全面爆发。今日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旦爆发金融危机，老百姓的6万亿储蓄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好在政府比较清醒。中央曾经一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最近朱总理在形势报告中一再强调，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有这一点老百姓就放心了。就怕落实不了。

(作者杨继绳 新华社高级记者 清华大学1966年毕业生)

(版权所有，转载、转摘请与本中心联系)

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10) 62789695

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楼302

邮 编：100084

[返回](#)